

# 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严立贤

**【摘要】**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机会。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除了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时由毛泽东、彭德怀提出的几种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方案实际上都是很难实施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江西苏区,转移到更广大的地域,寻找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明发现的科学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广阔天地。

**【关键词】**福建事变;十九路军;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

**【作者简介】**严立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文出处】**《军事历史研究》(京),2019.3.89~98

众所周知,1933年11月发生的福建事变给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以往的主流观点都认为是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才导致中央红军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计划的破产,最后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不得不开始战略大转移。本文认为,配合十九路军作战设想的流产和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因“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领导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它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如果一直由毛泽东、朱德来正确地领导中央红军,或许可以推迟反“围剿”失败的到来,但最终很难取胜,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由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提出的几种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方案,如红军主力北出苏浙皖赣、红军主力袭击蒋介石平叛部队侧后方和直接入闽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等,实际上都是很难实施的,不太可能从根本上

扭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最终结局。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江西苏区,转移到更广大的地域,寻找实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明发现的科学的军事战略战术的广阔天地。

## 一、红军主力从北面突出的计划难以实施

1933年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在国民党内陈铭枢、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的策动下,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此即所谓“福建事变”。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十几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出现了。

事变发生后,当时任第3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以及毛泽东和被博古、李德所控制的中革军委都先后对如何利用该事件打破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提出了较为相似的意见或方案。

时任第3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认为,福建事变是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

表面化,是长期以来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大资产阶级蒋介石的斗争的继续,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为此,彭德怀写了一个电报给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转中央临时总书记博古,建议:留5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1、3军团和7、9两个军团,跳出中央苏区,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以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扩大赣东北根据地,以便支援十九路军的事变,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sup>①</sup>

彭德怀之外,毛泽东也向临时中央提出了一个与之相似的计划,即:利用福建事变吸引蒋军一部南调入闽的时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中央苏区,而“无疑地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迫使进攻苏区之敌不得回援其根本重地,用这种方法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用这种方法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毛泽东认为:“此计不用,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sup>②</sup>

当时为博古和李德所控制的中革军委也提出并实施了他们的计划。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提出“以相当兵力钳制东北的主要敌人,而以其余的兵力调到西方转为反攻……第十军应保持其原有的基本地域,并侧击经上饶开浦移动中的敌人的纵队……第七军团和资溪、光泽的独立团以及其他游击队,仍在东北方面,其任务是发展游击动作与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sup>③</sup>20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军委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提出“要转移突击方向到西方(永丰古县)去,此处是敌人最弱的地位,我们的目的是消灭乌江以南及以北的敌人部队和恢复我们的苏区”。该指示还根据以上要求重新组织了东方军、中央军和西方军,并下达了各部队的行动方案。根据这一指示,被编入中央军的红9军团应在东方军左侧进行游击战争和短促地突击敌人的右侧,目的是防止江西方面国民党军进入苏区纵深;由红1、3军团编成的西方军(主力部队),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指示要求红1军

团和红3军团应分开活动:“第三军团应经康都洛口至古县东北的地域”,“第一军团立即转移到乌江北岸与独二、独三及独十一团协同消灭税警团的部队并相机消灭敌第九十二师第二十七师及第三师的部队”。<sup>④</sup>1月2日和3日,中革军委又发出《三军团行动命令》和《三军团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提出“蒋介石入闽之五纵队沿拿口、顺昌、洋口之线向王台、青州前进,其先头部队似已逼青州,有绕过延平十九路军堡垒深入闽中模样”,要求红3军团“向东突击”。<sup>⑤</sup>这就是著名的中革军委关于主力部队向西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的计划。有论者认为,红军的这一行动确曾给国民党军造成一定压力,中革军委这一计划和当时彭德怀的建议及毛泽东的出江、浙进扰国民党军后方的设想可谓异曲同工。<sup>⑥</sup>但笔者认为,彭德怀、毛泽东主张向东北突出,中革军委主张向西北突出,都是要从北面突出国民党军的重围,到国民党军后方进行活动,以寻找新的战胜国民党军的机会,因此具有一定的相似的效果,但中革军委的计划将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两个主力分开活动则大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不符合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原则(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因而从总体上说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军事计划。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当时能够按照彭德怀、毛泽东的计划来指挥红军作战,是否就一定能够打破国民党蒋介石的“围剿”行动?笔者认为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彭德怀、毛泽东和中革军委的计划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以主力从北面突破国民党军的重重碉堡封锁线:彭德怀的计划是北出“闽浙赣边区”,毛泽东的计划是“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中革军委的计划是“主力部队”“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彭德怀和毛泽东的计划是向东北方突破,中革军委的计划是向西北方突破。笔者认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进入后期阶段的情况下,无论是从东北方还是西北方,都不太可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碉堡封锁线(中革军委将红1军团和红3军团分开作战进一步削弱了突破的可能性),从东北方突破的难度则更大于西北方。在当时,中央红军要想从东北方突进

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突破苏区北面的碉堡群,然后从浙西衢州一线向东挺进;一条是越过闽江,由闽北浙南的崇山峻岭突出。而此时苏区北面已由蒋介石的北路军沿黎川、南丰到赣江一线构筑了纵横交错的碉堡封锁线。蒋介石在北线布置着30多个师。闽变发生后,蒋介石抽出第3、第4、第9、第10等11个师入闽作战,另有十几个师住在碉堡里日夜把守,绝不敢有丝毫放松,还有十几个师在碉堡后面作预备队,准备随时增援任何一处面临威胁的把守处。因此,红军要想突破此线,基本是不可能的。而闽北浙南则横卧着仙霞岭、雁荡山和括苍山三座大山,崇山峻岭,只有几个隘口可以攀爬通过,而蒋介石已经命令第8军军长赵观涛和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保安处处长俞奉时在那些隘口构筑了层层碉堡线,<sup>⑤</sup>红军要想由此通过无异于登天;即使没有构筑碉堡群,任红军主力自由通过,数万人马要通过如此险峻的隘路,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董必武在1936年时回忆说:“当时正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即碉堡——引者注),大部队通过较困难。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这是毫无疑问的。”<sup>⑥</sup>因此,笔者认为红军主力不大可能突进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即使一定要从东北方突出,也不应该在福建事变时才进行,而应该在此前碉堡群没有形成之前就进行。福建事变发生时第五次反“围剿”已到后期,国民党北路军的碉堡封锁线已压缩、深入到苏区中心地区,此时红军早已失去了由北面或东北方突围的有利时机。

对于福建事变期间红军主力无论是从西北方还是东北方都难以突破的情况,李德在被迫执行他的上级——身在上海的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代表斯特恩(化名弗雷德)关于“挺进到永丰地区活动,从左翼绕至蒋介石军之后方”的指示时,<sup>⑦</sup>派部队做过侦察并得到证实。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我在军事委员会还违心地宣读了弗雷德关于在盱江和赣江之间建立堡垒以及在东北地区向敌人后方发动进攻的建议(这个在东北地区向敌人后方发动进攻的建议应该就是指彭德怀或毛泽东的建议——引者注)。……为了消除任何怀疑,我建议,命令第一军

团派部队到永丰进行侦察;同时,我请博古要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表态。这两个建议都通过了。不出所料,军事侦察的结果表明,敌人在赣江以东向纵深层层修筑堡垒,不是我们的兵力和其他手段所能突破的。同时肖克派人报告,说第六军团在赣江以西也遇上了坚固的堡垒而不得不返回原地。”<sup>⑧</sup>李德的这个说法主要是表达对他的上级斯特恩的不满,基本上是可信的。

## 二、侧击蒋介石平叛部队计划难以奏效

福建事变发生时,还有一种常被提到的配合事变粉碎国民党军“围剿”的方法,就是正式见之于遵义会议决议的那种红军从蒋介石平叛部队侧后方发起攻击、直接进入福建境内援助十九路军的方法。遵义会议决议中说道:“(博古、李德)以为红军继续在东线行动打击进攻十九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是等于帮助了十九路军。因此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的去攻击永丰地域的堡垒,失去了这一宝贵的机会。根本不了解十九路军人民政府当时的存在对于我们是有利益的,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这正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为了粉碎五次‘围剿’。”<sup>⑨</sup>

实际上,在事变发生后,李德也是认为应当“进入福建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回忆道:福建事变发生后,在红军应否进入福建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问题上,在“上海(斯特恩)与瑞金(博古、李德)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根据弗雷德(斯特恩)的计划,第一军团开拔至永丰,第三、五军团在广昌待命。在此期间弗雷德用无线电发来一个经上海局批准的详细计划。计划规定,在一个月之内集中主力向江西西部迅速挺进,直至湖南边界;除占领南昌外,也要尽可能地攻占长沙。”李德说道:“这个计划太冒险,太不符合实际力量的对比情况,因此遭到了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的坚决拒绝。我也反对这个计划。……(但斯特恩)明确表示,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军事代表,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命令我,一定要排除一切阻力贯彻他的计划。因此我内心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sup>⑩</sup>也就是说,李德实际上也是像毛泽东一样,主张进入福建直接配合十九路军作战的,是斯特恩的阻挠才使得其

不能采取这个行动。

但是,笔者认为,即使实行“在军事上突击蒋介石侧后方以直接配合十九路军的行动”,也不一定就能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因为这只是一种设想,其能否取得成功,还要看国民党军方面的设想和布置。如果国民党军方面没有提前预见到其平叛部队侧后方的软肋,被红军钻了空子,那红军就有可能乘此机会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如果国民党军早有预见并作了周到的布置,红军就很难从此获得反“围剿”的转机,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不幸的是,实际情况正是后者。

蒋介石也许不是一个军事俊才,但不可能没有基本的军事常识,他知道在他向福建十九路军发起攻击时,必须防护侧背受到中共红军的攻击。福建事变于11月20日发动后,蒋介石24日就在南昌行营确定了平定事变的计划。按此计划,除令西南两路仍按原定计划继续进剿红军外,并令北路军准备抽调第3、第4、第9、第10等11个师归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入闽平叛。同时,蒋介石又以北路军主力掩护入闽平叛部队前进,迅速占领赣、闽边境之德胜关、泰宁等要点,这样一来可以防护侧背受到红军的攻击,二来以截断福建方面与江西红军之间的联络。<sup>⑤</sup>特别是德胜关,其“扼于闽、赣边境,为赣东通往闽西泰宁之孔道,四周环山,形势险要,为闽、赣两省军事及政治上联络之要点”<sup>⑥</sup>。12月11日,蒋介石令平叛部队由蒋鼎文统帅分三路向福建挺进,同时为策应入闽部队作战,令第5、第8两纵队由黎川向团村及德胜关进攻,以掩护入闽部队侧背免受红军的攻击。12日晨,国民党第5、第8两纵队由黎川附近向德胜关一带围剿,在三都圩及团村、东山等处与中共第3军团全部、第5军团大部及第1、第7两军团各一部遭遇,激战竟日。至15日晚,国民党军第5纵队除第94师仍在河塘附近外,第14师推进至东山附近,第11、67两师在德胜关附近清扫战场,第八纵队之第6师扼守少顶巢,第5师、第96师推进至东山、德胜关之间地区,德胜关完全为国民党军所占领。国民党军方面资料称:“综计自攻占团村迄占领德胜关,先后毙匪千余,俘敌五百余名,俘获步枪三百余,轻、重机枪十余挺,击毙匪第六师师长张锡龙及第三

师参谋长两名,匪第十三、十四两师伤亡最大,十三师几全部溃散,我军亦伤亡官长六十余员,士兵七百余名。”“我军占领德胜关后,闽逆与赣匪之联络遂被截断,而我闽赣两方得以连成一气,使我讨逆军事,得到甚大之协助。”<sup>⑦</sup>“我军肉搏冲锋,奋勇痛击,予匪重创,入夜,匪复数次猛冲,亦经我军沉着击退,至十三日午,我军占领团村、东山,残匪向德胜关及熊村方面逃窜。十五日,我军续向德胜关猛攻,在陆空协同及炮火掩护下,猛烈冲击,于二十一时许攻克德胜关。此地扼闽、赣边境,为赣东通往闽西泰宁之孔道,四周环山,形势险要,我军占领德胜关后,闽逆与赣匪之联络遂被截断。而资溪县城亦已于十四日为我军攻克。”<sup>⑧</sup>

红军在团村战斗中曾取得较好的战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记载:“12月12日,国民党军为保障其进攻福建第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以第八纵队周浑元三个师在第五纵队罗卓英两个师策应下,由黎川南出,向团村、东山、德胜关进犯,其中两个师向红五军团阵地发动进攻。朱德与周恩来急令已奉命西调但尚在团村附近的红三军团和第三师、第三十四师从东西两个方向对敌反击。但因兵力不集中(由于按照博古和李德决定的作战方针,与红一军团分兵作战),仅打成击溃仗,国民党军大部得以逃脱。”<sup>⑨</sup>有论者借用彭德怀的话说道:“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灭二十个团左右,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sup>⑩</sup>

国民党方面对于团村战斗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台北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对于团村战斗是这样记载的:“文(12日)晨我第五、第八两纵队由黎川附近向德胜关一带攻剿,在三都圩及团村东山等处与匪第三军团全部及第五军团大部及第一第七军团各一部遭遇,激战竟日,至元(13日)午经我各部奋勇痛击,均经先后击溃,我军已占领团村东山,残匪纷向德胜关及熊村各方向狼狈逃窜。是役毙获尤众。”“团村之役,匪诱我深入,我盛团进至宝盖峰,李团进入团村附近,伪第三军团第四、五、六各

师及第十三第十四师大股顽强抵抗,当经盛李两团肉搏冲锋,前仆后继,激战至申刻,卒予匪以巨创。时近黄昏,熊团占领撮斗寒一带高地筑阵固守。匪复乘夜数次猛冲,均经我守兵沉着痛击,均不得逞,于元日拂晓分向东山熊村退窜。是役毙匪千余名。”<sup>⑩</sup>

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也许不是很可信。但是,如果认为当时若红1军团在场配合红3军团作战就一定能够全歼国民党军3个师的兵力,也是言过其实的。若想找机会再歼灭国民党军20个团的兵力,相当程度上也只是一种幻想。倘若红军采取第1、第3军团联合作战的方式,蒋介石也会采取其他相应的兵力配置方法,而不会仍按原有的兵力配置进行作战。不能以我方后来设想的新的兵力配置方案来设想敌方按旧有兵力配置情况下的战役结局。显然,彭德怀的回忆有着很大的受写回忆录时的政治环境影响的因素,不一定能够完全真实地反映当时战争的实际情况。如有论者就认为团村战斗的结局是:“红军在团村集结主力击溃进攻部队一部,但在国民党军主力乘机集结,欲在此形成主力决战背景下,被迫向后撤退。”<sup>⑪</sup>16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德胜关,红军被迫往泰宁方面转进。为防红军由泰宁向北撤退并袭击国民党军第5路军后方,蒋介石又于次日命令第5纵队“占领金坑。”<sup>⑫</sup>国民党军第5纵队当即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向熊村、黄土关、金坑方向推进并截断了建(宁)、泰(宁)红军通往光泽方向的退路。国民党军同时还加紧了构筑碉堡的速度并打通和巩固了与光泽方面的联络。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国民党军得以确保入闽通道的安全。如有论者认为,“由于浙赣边界和浙西国民党军入闽部队本身就受红军威胁甚小,因此,当闽赣边境入闽通道基本打通后,国民党军入闽事实上有了相当的安全保证。”<sup>⑬</sup>

自德胜关被国民党军占领后,红军由赣东通往闽西的“孔道”已被截断,国民党之入闽平叛部队的侧翼安全得到了保障,红军试图通过侧击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计划也随之彻底破产。

### 三、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止于空想

德胜关被国民党军控制是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计划陷入流产的转折点。学界的主流观点都把

德胜关失守的原因归结于博古、李德错误地将红军第1、3、5军团主力分开,致使在团村战斗中因兵力不足而失利。笔者认为,即使没有“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能够按照朱德、周恩来的要求将红军3个军团的主力集中,在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下,也不一定能够收复德胜关;即使能够收复德胜关,也只是为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提供了前提,能否通过联合作战来粉碎第五次“围剿”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因为十九路军虽然发动了事变,但是,他们却完全没有做好与来平叛的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准备,甚至根本就没有作过这种打算。因为时至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出发之日,十九路军的主力尚在闽南,第60师在泉州,第78师之一旅驻福州,其余在莆田,第49师仍驻漳州(龙溪),根本没有任何战斗准备。<sup>⑭</sup>十九路军无论在事变前还是在事变后,都没有作过与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作战的任何打算,整个过程只是被动地等待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来将他们击溃。正因为十九路军没有任何准备与国民党中央军作战的迹象,才使得毛泽东、朱德十分焦急,于12月20日向其发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电》。电文指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的代表同你们的代表订立反日反蒋协定草约以来,已经有一个多月。但是,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的反日反蒋行动,亦没有看到你们在发动群众斗争与武装民众进行反日反蒋的方面有任何具体的实际工作,而蒋介石却已经派了3个纵队向福州与延平进攻,日本帝国主义也已经准备好以占领福州、厦门来响应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你们与福建广大民众是在极端危险中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郑重地告诉你们,在这一危险面前的任何消极与迟疑不决,对于中国革命是极大的罪恶。因此,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要求你们立刻依照我们反日反蒋草约上所决定的基本原则,采取断然的行动,集中你们所有的武装力量,立即开始反蒋的决战。同时必须最坚决地发动与武装广大的民众,组织真正人民革命军与义勇军,真正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的民主权利,来开展反日反蒋的群众斗争。我们相信只有依靠于千百万广大民众的力量,我们才能取得最后胜利。我们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准

备在任何时间同你们联合,同你们订立作战的军事协定以反对与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我们盼望你们迅速告诉我们你们的决定。”<sup>③</sup>

十九路军不仅没有准备与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作战,而且也防备红军进入他们的地域。他们与红军所签订的,不过是一份停战协议,而不是联合作战协议。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各在该线不得控置主力部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本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也就是说,他们是绝对不允许红军的一兵一卒进入他们的地域的。对于联合作战问题,协议规定,“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于最短期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sup>④</sup>。但实际上在停战协议签订后,再也没有对下一步联合作战问题进行任何磋商,而当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向福建开进时,十九路军并不是立刻动员备战,而是期待红军将其击溃。如陈铭枢回忆:“当我从红军发来的电报中得到已有两个师的兵力经过江西黎川向我方推进时,认定江西境内红军可以把蒋军击退,于是劝大家不必顾虑。但我忽略了当时十九路军和红军合作的具体条件尚未订立,红军没有义务代我挡击蒋军,从而延误了战机。因而当蒋介石到建瓯设立行辕,亲自指挥10倍于我的兵力,从东、西、北三路环攻我们时,我们坚持了近两个月而最终被镇压下去。”<sup>⑤</sup>

十九路军不允许红军进入其地域的规定直至延平、水口被中央军平叛部队克复以后,才被迫开始改变。1934年1月5日,国民党中央军平叛部队克复延平(守军第6师师长司徒非叛变,倒向蒋介石),7日克复水口,13日克服古田(第7师师长赵一肩倒向蒋介石)。据张云逸回忆,十九路军9日派参谋处长尹时中抵达瑞金,告急求援。尹先后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博古、洛甫等人,再三请求红军主力东移,与十九路军联合对敌。但是,由于没有得到远东局和斯特恩的批准,李德、博古等人不敢答复。不过,博古同意派张云逸以“军事联络员”名义入闽。张云逸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寒暄一番以后,李济深劈口就问张

云逸:“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张云逸回答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非(十九路军第6师师长、镇守延平)旅被消灭了;(蔡)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也就是说,败局已定了——引者注)。”这说明,即使红军能够应尹时中的要求立即派兵支援,也已经来不及了。张云逸回忆说:“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悄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sup>⑥</sup>其实,事变发生当时就有分析者看出,福建“政府”根本无意与红军进行合作:“福建‘政府’与红军联合吗?有时听到群众中的呼声:此次福建独立,是与红军有连(联)络。这是否是事实,尚无材料证明。不过就目前情势看连(联)合的可能性很少。因为(一)福建军阀是依帝国主义为动,(二)他们已成立反动政权,(三)没有诚意及决心执行红军所提出的三个条件。”<sup>⑦</sup>后来,李德在1939年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中明确说道:“(苏区)派出了政治代表和军事代表(潘汉年和张云逸),他们要商量向蔡廷锴提供经济和物资援助,而不是军事援助。事实上,据我所知,这两位代表只签订了(某种)划定领土分界线的互不侵犯条约。在第一个时期,蔡廷锴明显不希望得到我们的军事支援,他担心这会在政治上给他造成损害,特别是在广东,而面临灾难时,他改变了态度,但为时已晚。这样,蔡廷锴始终不接受我们向闽北(延平)推进的建议,而延平陷落后,在闽中只同意我们推进到(闽西)归化,这还是在那里的52师师长公开转到蒋介石方面之后。”<sup>⑧</sup>所以说,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以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只不过是红军单方面的意愿,真要实行起来是相当困难的:在事变的前一个时期是不能实现的,而到后一个时期则又为时已晚了。

再退一步说,如果实现了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作战,就一定能够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吗?恐怕未必。红军即使能够与十九路军联合作战,实际上也很难突破已经成功完成的北部碉堡封锁线,以及横卧闽北与浙南之间的崇山峻岭。红军根

本不可能从北部突围,而福建的东部和南部都是大海,无从出处。红军与十九路军的联合,会使红军的活动范围大大增加,但在蒋介石的碉堡政策下,充其量只能延缓崩溃的时间,而不能最终避免失败的命运。所以,有论者针对福建事变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于此的对策作了如下评论:“众所周知,中共领导内部各派的立场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的作用问题,就在于红军没有给予福建部队以有效的支持,从而加速了它的失败,而在福建事变后不久也招致了自己的失败,这个问题在党内斗争和中共领导内的派别斗争中被用来谴责和反谴责谁是丧失中央苏区的‘罪魁祸首’。至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党史著作中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因而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红军和19路军更积极地相互配合确实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局势,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等等。依我们看来,在南京军事机器比与它对立的力量具有决定性的和多倍优势的情况下,即使红军和19路军密切配合作战,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稍稍延缓它们的失败和以后的事态发展结局。至于这次事变对于以后修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中共的政策有什么教训,那是另一回事。”<sup>⑧</sup>

1月10日,国民党中央军海军克复厦门。13日,中央军平叛部队克复古田。16日克复福州。蒋介石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一鼓荡平了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之后,中央红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机会就此失去,中央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出路了。

#### 四、应到更广阔的地域去实施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

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敌人非常强大,而革命初期武装的力量则非常的弱小。根据这个特点,毛泽东在总结10年内战特别是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条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路线,也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基本的军事路线。这条军事路线在遵义会议决议中有了初步的总结和论述,在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得到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阐述:“经过了一次大革命

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从这些特点出发,就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许多战略战术的原则。”<sup>⑨</sup>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剿和反围剿”;主要战略是包括“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的“积极防御”;为了实现战略反攻,必须采取“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各种战术。毫无疑问,这是一条适合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国情的科学的军事路线。但是,实施这条科学的军事路线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有可供实施这一军事路线的比较广阔的地域。如果没有这种相对广阔的地域,要想实施包括退却、反攻、集中、分散、运动、速决、歼灭等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战略战术,是不可能的。在经历了四次残酷的“围剿”和反“围剿”战争之后,到了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它的后期,中央苏区无论从地域还是从人力财力物力方面来讲,都已经无法继续承担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围剿”行动,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应该是或迟或早的事情。

根据一些研究,江西中央苏区至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已经走到了尽头,丧失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中共的工农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即使第五次反“围剿”由毛泽东指挥取得胜利,也是迟早的事情。其根本原因在于“红军大量‘扩红’,抽去根据地主要劳动力,生产无法维持,经济极度困难,群众不满,使红军无法立足,不得不转移”<sup>⑩</sup>。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到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前,中央苏区约有正式红军8万余人,以及一些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但在当时,据杨尚昆回忆:“蒋介石握有全国政权,可以调动全国的军事力量和战争物资,中央苏区只有二十几个县,近300万人口,力量悬殊。”<sup>⑪</sup>中共力量很弱小,而大规模地扩大力量、扩展红军却又是是不可能的。20几个县的不到300万人口,最大能支撑一支多大规模的军队呢?中央红军还能扩大到何种程度呢?它能承担得了国民党军队反复地不断地“围剿”吗?显然,它是有限度的。不仅如此,中共临时中央自迁入中央苏区后,又无视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声称要创造100万红军,这无疑是在痴人说梦。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统治使承

载力原本就几近极限的中央苏区立刻陷入了崩溃的边缘。有论者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因为“前四次反‘围剿’固然取得了胜利,但一次紧接一次的拉锯战毕竟严重破坏了根据地经济,中央苏区的人力物力已经不起更大消耗,资源已近枯竭,到敌情空前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便难再支撑了”,而且类似的情况“在鄂豫皖,在川陕,都可以看到”<sup>①</sup>。有论者明确地提出,根据地的建立必须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如江西中央根据地,虽位于几省交界的偏远地带,但仍属于中国心脏地区,其稍一发展扩大,便不可避免地会威胁到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主要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从而引发国民党军的持续“围剿”。战争越打越大,红军势力必须不断扩充,因此,苏区必须不断扩大才能满足红军在人力和物资等方面的要求。而苏区的扩大会越发加剧国民党的恐惧,使战争进一步扩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既无足够物资准备又没有足够回旋余地的红军,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sup>②</sup>更有论者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中并不存在红军军事失利的情况,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长征的根本原因不在军事失利,而在苏区经济的崩溃。<sup>③</sup>毛泽东、朱德等中共军事领导人虽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也不可能在地域和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取得反“围剿”的胜利。

狭小苏区的人力物力承担不起以全国人力物力为基础并得到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的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中共军队的战略大转移是必然的。中国工农红军必须离开南方苏区一隅,到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大西北,去寻找运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发明发现的卓越军事路线的广阔地域。这是笔者的结论,也是历史的结论。

#### 注释:

①王焰:《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2页。实际上,李德曾在军事委员会宣读彭德怀的这个建议,并在此前派部队作了侦察,发现东北方国民党军重重碉堡群根本无法突破之后才放弃实行的(见后文)。

②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上),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1948年,第303页。

③《军委关于目前作战的决定》(1933年12月1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1992年,第125-127页。

④《军委关于转移突击方向和组织三个军及各军动作的指示》(1933年12月20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第129页。

⑤《三军团行动命令》(1934年1月2日),《三军团向东突击动作的命令》(1934年1月3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上),《江西党史资料》第21辑,第135-136页。

⑥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⑦早在福建事变发生前的1933年8月24日,蒋介石即电第8军军长赵观涛,令在铅山、崇安、浦城之间要隘处赶筑碉堡。电曰:“闽北之匪,待我向闽西进剿时,彼必由铅山、崇安、浦城之间窜扰,以牵制我进剿部队,故于此时务将此一带各要隘赶修并督建碉堡工事。及地方自卫队守御之技能以何者为最首要,凡不急要之他处,如无暇则可以不去,惟此一带则必须亲自校阅。对于可靠团队,可酌给旧枪手榴弹,并派员切实训练,固定负责,指导其坚壁清野之各种办法,再派少数兵力头目协助其守御。总须多筑碉堡,纵横层叠、星罗棋布,使匪窜入而不能逃出,俾得围而成擒也。”又电浙江省主席鲁涤平、保安处处长俞奉时,令其在浙省近闽各地隘口构筑碉堡以加强防务。电曰:“闽北之匪,将来恐窜入浙边,以牵制我军进剿,务望于龙泉之八都、小梅,清源之八都、吴村、黄阮隘等处,以及遂昌西都与江山之廿八都峡口,层层建碉修堡,豫给民众自卫枪弹与手榴弹,并派员切实训练校阅,固定负责指导防御为要。”(《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2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13-114页。)

⑧必武:《出发前》,《红军长征记》上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第3页。

⑨对于这个军事计划,李德明确说是“来自弗雷德的建议”。《布劳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1939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并且在他与斯特恩之间就此“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⑩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78页。

⑪《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1月8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4-465页。

⑫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77-78页。

⑬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台北:中正文教

基金会,1978年,第380页。

⑭“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2册,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67年,第314页。

⑮“国防部”史政局:《剿匪战史》第2册,第314页。

⑯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86页。

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上册,北京: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60页。

⑱黄少群:《彭德怀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上篇)》,《党史文汇》1998年第6期。彭德怀原话见《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7页。

⑲《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24册,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96-97页。

⑳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㉑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第三路军五次进剿战史上,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1937年印行,第5章,第17页。

㉒黄道炫:《重析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㉓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2,第385页。

㉔《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与十九路军的第一电》(1933年12月20日),福建省档案馆:《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97页。

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3年10月26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9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570-571页。

㉖《陈铭枢回忆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26页。

㉗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误》,福建省档案馆:《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224-229页。

㉘《达尼对福建事变的分析给玮的信》(1933年11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第279页。

㉙《布劳恩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关于福建事变的调查材料》(1933年9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第339页。

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册,“前言”,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0页。

㉛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上册,第266页。

㉜唐宝林:《关于广州中国革命史学术研讨会答〈广东党史〉记者问》,曾庆榴、洪小夏:《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香港:华星出版社,2000年,第420页。

㉝《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97、98页。

㉞马福生:《红军长征史研究所见与所想》,曾庆榴、洪小夏:《中国革命史研究述论》,第115页。

㉟杨奎松:《内战与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

㊱单人麟:《红军长征的主因是经济问题》,《甘肃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

## Miscarriage of Cooperation Plan with 19th Route Army and Central Red Army's Failure in Fifth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Yan Lixian

**Abstract:** The Fujian Incident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entral Red Army to smash KMT's fifth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against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19th Route Army. The abortion of the cooperation plan and the failure of the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 was inevitable although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left" opportunistic line and the wrong military leadership of Bo Gu and Li De were partially to blame. There were several plans proposed by Mao Zedong and Peng Dehuai to cooperate with the 19th Route Army, but they were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to implement, and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fundamentally reverse the final outcome of the fifth counter campaign. The Red Army of Chinese Workers and Peasants had to leave the Soviet Area of Jiangxi and to find a broader spa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cientific military strategy and tactics created by the CPC with Mao Zedong a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Key words:** the Fujian Incident; the 19th Route Army; the Central Red Army; the Fifth Counter Campaign against "Encirclement and Suppression"